

摘要:舆论场的演化遵循社会物理学的基本规律,从舆论的形成到舆论场的发展都呈现动态变化的趋势。本文创新性地提出了舆论场结构演化的四个阶段:单核管制舆论场、双焦椭圆舆论场、莫比乌斯舆论场、单核共生舆论场,分析了舆论场演化过程中的三步跃迁内在演化动力及驱动因素,为舆论与舆论场的引导与构建提供了理论创新基础。

关键词:舆论场 结构 演化论 统一

舆论场结构演化论

■ 李后强 彭剑 李贤彬

一、引言

自上世纪九十年代以来,互联网舆论在中国社会深刻转型的背景下跌升为一支重要而独特的话语力量,它的反叛与颠覆、理性与非理性、复杂与涌现,建构着当下中国复杂的舆论景观,形成了全新的社会舆论场。深入研究和探讨互联网背景下社会舆论的形成及舆论场结构的演化,对于我国舆论引导工作具有重要价值和意义。

1、舆论与舆论场的形成

舆论是社会生活中公众对某一事态所持的意见或看法,是信念、态度、情绪和行为的总和^①。也是不同的社会群体,基于既有信念和认知框架,对宏观社会变动或微观社会事件进行认知分析后所形成的集合性意见,舆论的生成是动态的集中过程,也是复杂的汇聚过程。

舆论的汇聚和集中形成了“舆论场”。有学者指出,“舆论场”是助推公众意见表达与传播的社会氛围,是媒体场、心理场、社会场交互的共生环境^②。随着大众传播媒介的发展,公众社会生活的时空环境不断拓宽,感知触角不断延伸,舆论触发机制更加多元,舆论场成为意识形态领域最为重要的言论表达场域,对主流媒体的形成和产生影响产生着至关重要的作用。

舆论场具有复杂的结构和演化机制。首先舆论场围绕媒介产生及分化,并随着社会发展而形成的。这是因为公众的意见是以大众传播媒介为载体而汇聚的,公众意见围绕传播媒介形成具有较大声势和影响力的舆论场域。然而随着媒体类型的增加以及社会群体的变动,舆论场又呈现出基于介质和群体的分化趋势,如新华社前总编辑南振中曾提出当前存在着两个舆论场的两化:一个是党报、国家电视台、国家通讯社等为代表的“官方舆论场”;另一个是依托口口相传的互联网为代表的“民间舆论场”。两个舆论场自说自话,并不能完全重合;而学者刘九洲等则把我国社会舆论场划分为三个:“一是政府舆论场,即体现党和政府意志的舆论场;二是媒体舆论场,在这个舆论场中,媒体既反映党和政府的路线方针政策,又表达民情民意;三是民众舆论场,它通常是民众从自身利益、情感和意愿出发而形成的舆论场。这三个舆论场交汇的部分就是整个社会舆论统一的部分,它们交汇的部分越多,则说明整个社会的舆论越统一,社会舆论环境越和谐,反之亦然”^③。其次各个舆论场的演化机制具有较大差异性和独立性。以报纸、广播、电视为代表的传统媒介形成的是官方舆论场,是以具有一套完整的传播机制、根植于政治体系的媒介组织为载体形成的,受到政治目标、组织体制和宣传任务的制约,因而形成了带有正面宣传为主的主流化和模式化传播方式,并在日常新闻报道中发挥着一定的社会监督作用。而互联网的出现则对传统主流媒介舆论场产生了巨大的分化作用,互联网技术优势是为社会大众赋权,使大众由失语走向前台,“人人都麦克风”共同造就和助推社会舆论的网络化、底层化和平民化,形成价值多元、形态丰富、表现多样的民间舆论场(或自媒体舆论场)。两种舆论场因地位不同、性质各异,围绕着社会问题不断地相互激荡和冲撞,形成了舆论场之间的撕裂和对立。

2、当前舆论场的撕裂现状对社会的危害

一段时间以来,以传统媒体为载体的官方舆论场和以互联网为载体的民间舆论场的割裂,呈现出自说自话甚至互相矛盾的传播状态。尽管这在一定程度上避免了舆论趋同而造成的舆论振荡,但却对社会发展造成了极端的负外部效应。

当前,舆论场割裂造成的负面影响主要有以下三点:

(1)媒介交流断裂

根据吉登斯的结构化理论,社会结构和社会行为之间具有互构作用,社会结构催生特定的社会行为,社会行为又不断固化现有的社会结构。

转型期的中国社会矛盾凸显,阶层流动性差,社会财富分配不均造成了精英阶层与大众阶层的分立,继而导致媒介行为的分裂与畸变。以官方媒体为主的官方舆论场强调宏大叙事,从正面建构议题,将信息传递建立在正面的视角之上,成为社会正能量的传播者和社会风尚的提倡者;而围绕互联网形成的民间舆论场则以个体为切入,喜好从负面解构议题,以揭露和抨击的笔法迎合大众的“反叛”心理。

同时,舆论撕裂导致官方媒体与自媒体之间缺乏有效沟通,议程设置缺乏有机

联系,各自画地为牢导致媒体舆论监督职能弱化,甚至面对同一议题呈现出截然不同的论调。如,以2010年发生的“药家鑫案”为例,活跃于微博和论坛等网络媒体的公众,坚持认为药家鑫的行为是故意杀人,毫无疑问应该伏法;而某些传统媒体则以电视节目的形式解析其行为属于过激杀人,并通过介绍药家鑫的日常生活为他进行人格背书。

两个舆论场的割裂造成了积极和消极的二元对立,迫于阶层利益和受众需求,其各自的传播行为与现有的传播轨道背道而驰,进而加剧了社会碎片化意见的形成。

(2)大众行为分化

社会大众囿于活动范围和注意力资源的限制,无法对外部环境和众多社会事物保持有效接触,对于无法直接体验、超出其感知范围的议题,大众只能依赖新闻媒介来了解、认知和做出反应。

显然,两个舆论场的分立,导致官方舆论场与民间舆论场呈现出不同的社会情境,塑造了具有明显差异的意见环境。大众对于不断分化的舆论环境进行选择性地接触和认知,导致了较大范围内社会大众行为的分化。社会成员为避免遭受孤立,将会对同一舆论场中的话语群体进行更为冒进的认同和复制,加剧了群体极化的倾向。

舆论场的撕裂阻塞了社会信息交流,左右了社会成员的社会认知和社会行为,导致了社会成员之间的不断割裂和信任缺失,不利于和谐社会的建设和发展。

(3)事态发展多变

网络社会是现实社会的映射,是现实人际关系在网际间的重新组合,以网络为代表的民间舆论尽管带有明显的个人色彩,但其舆论议题深植于社会现实。网络舆论与主流媒体舆论有重合部分,两者重合交汇的部分越多,社会舆论环境越和谐,越有利于舆论引导。

但事实上,一段时间以来,舆论场的撕裂使得官方与民间的声音无法形成合力,甚至互相拆台,舆论力量内耗和冲突,民众参与社会生活的渠道更加逼仄,致使事态进展迟滞,舆论热点交错杂乱,民众意见弥散和分解,难以形成有效的舆论合力。

两个舆论场的存在初期,更多是官方舆论与民间舆论的争夺和冲突。民众对自身利益的表达使得网络成为他们新的泄愤场所,两个舆论场之间呈现各自为政的分裂之势。这导致传统主流媒体舆论的引导失效,网络舆论的引导成为一个新的时代课题。

二、文献综述

关于舆论场的研究,国内外均有不同的著述和理论成果。相比之下,国外研究成果更注重从理论层面对舆论场的形成、运行规律及社会影响进行研究。而国内研究成果则侧重于实践研究,旨在指导不同舆论场的打通与实践,形成有利于社会发展的舆论氛围。

近来国内关于舆论场的研究成为一个重要热点。通过CNKI搜索关键词“舆论场”发现,1992年—2015年间国内研究舆论场的论文共2847篇。其中2009—2014年研究论文逐年快速上升,由2009年的100篇上升到2014年的峰值953篇。理论研究是对现实问题的重要回应,舆论场的研究成果也反映了现实的巨大需求,尤其是我国处于转型期的社会背景下,政府及主流媒体对社会舆论的关注度提升了舆论场的研究热度。国内关于舆论场的研究主要集中在以下方面:

一是关于舆论场概念的研究。国内学者从不同角度对舆论场进行了界定和论述。刘建明教授从舆论形成的外部环境角度出发,认为舆论场是指“包括若干相互刺激的因素,从而能使许多人形成共同意见的时空环境”^④。也即将舆论场暗喻为舆论形成的场所和环境,有学者将之称为舆论界定的“时空环境观”,既将舆论场认定为舆论得以形成的外在要素,国内研究者多依据这一概念进行相关研究。而余秀才则从多个层面研究舆论场,尤其认为“网络舆论场不单指时空环境,而是糅合了行为环境、心理环境与社会环境的复杂环境”^⑤。将舆论场延伸至互联网,界定了特定的网络舆论场的内涵,这类界定被称之为舆论界定的“复合环境观”。

除了对舆论场进行界定外,学界与业界还对舆论场进行了区分。学者王国华在《论舆论场及其分化问题》中认为,目前关于舆论场区分较为多元。以载体为视角,将

【基金项目】

四川省科技厅应用基础研究计划“服务于决策支持的社会舆情大数据集的高阶NARMAX理论系统研究”,项目编号“2015JY0086”

【作者简介】

李后强,理学博士,四川省社会科学院党委书记、教授;

彭剑,新闻学硕士,四川省社会科学院新闻传播研究所所长、副研究员;

李贤彬,工学博士,四川省社会科学院金融与财贸经济研究所副教授。

舆论场分为传统媒体舆论场和网络舆论场;或以传播介质为视角,将舆论场分为媒体舆论场与口头舆论场^⑥。新华社原总编辑南振中提出“两个舆论场”概念,认为现实生活中实际存在着两个“舆论场”:一个是老百姓的“口头舆论场”;一个是新闻媒体着力营造的官方舆论场。尽管口头舆论带有明显的感情色彩,有时难免会有片面性和夸大渲染的地方,但口头舆论涉及到人民群众关注的、关系他们切身利益的重要问题和重大社会动向,往往成为社会的“风向标”。主流媒体应该加以认真研究,应从群众的口头舆论中触摸到社会跳动的脉搏^⑦。

二是关于主流媒体舆论场的研究。对主流媒体舆论场的研究集中表现在关于主流媒体舆论引导力的研究上。一是研究主流媒体舆论引导力,认为社会领域的矛盾和问题,直接反映在舆论场中,当面对频发的热点舆论事件,如果主流媒体失声失语,就会将舆论阵地拱手相让,使小道消息大行其道,这对政府和主流媒体的公信力都是极大的打击。华冰《主流媒体舆论引导分析》、张鑫《在增强受众触媒黏性中提升主流媒体舆论引导力》、宣柱锡《把握受众特点变化,提高主流媒体舆论引导力》等研究都以此为逻辑起点关注如何提升主流媒体舆论引导能力问题。二是研究网络时代主流媒体舆论场面临的挑战及如何提升舆论引导力问题。认为新媒体环境下,传统主流媒体需要顺应传播环境变革的潮流,主动为民意自主表达提供有效窗口,积极回应民意关切。这样才能改进舆论引导效果,提升自身影响力。如张鑫《新媒体环境下主流媒体舆论引导的重要性浅析》、王长颢《微博时代如何提高主流媒体舆论引导能力》、王燕《新媒体时代如何提升主流媒体舆论引导能力》等文都做了较为详细的分析。

三是关于网络舆论场的研究。关于网络舆论场的研究内容较多,比较庞杂。其一是关于网络舆论场的构成或形成研究,如余秀才《网络舆论场的构成及其研究方法探析》中指出,对网络舆论场的构成进行了分析,认为网络舆论场由新媒介场、心理场和社会场交汇而成^⑧。而李艳红在《集体行为视角下网络舆论场的形成》则分析了另一种特殊情况下的网络舆论场形成,即网络流行语等催生的多种因素共同建构了网络舆论场的形成,显示了网络空间的群体力量,以及在话语制造方面的集体行为^⑨。其二是关于网络舆论场形成机制的研究。主要研究网络热点事件中舆论演化形成机制,分析了以大众意见为主的网络舆论场,如何演进到网络媒体与传统媒体的共振,再以大众传播媒介促成的舆论热点的爆发过程。其三是关于网络舆论场中的媒介权力及政治舆论传播的探讨。张燕等认为在网络舆论场中每个人都有生产信息与意见表达的权利,媒介不再是垄断性资源,媒介权力开始让渡于个体并以创新的形式存在。并分析了网络权力如何成为左右社会舆论与现实民意的隐性权力的过程^⑩。其四是关于网络舆论场的影响研究,如聂得民在《对网络舆论场及其研究的分析》中认为把场理论引入网络舆论的研究范畴,不仅是对“场”的本质属性的认识更加深化和扩展,也

是对目前网络舆论研究单面化和集中化的一种反思和提升,同时也扩展了思路、扩充了视野,运用新视角来深化了对网络舆论问题的研究。

四是关于打通两个舆论场的研究。关于打通“两个舆论场”既有对两个舆论场的界定和分析,也有如何打通两个舆论场的具体对策。如张征、陈海峰《简论“两个舆论场”的内涵与价值》中对两个舆论场的内涵与价值作了辨析和界定,并指出“两个舆论场”蕴涵着巨大的社会价值,对于创新当今时代的舆论管理具有重要意义^⑪。此外支庭荣等分析了社会化媒体时代两个舆论场复杂互动的分析,指出民间舆论场行使的主要是集合传播权而非个体传播权,因而舆论管理应容忍一定程度的噪音^⑫。在如何打通两个舆论场方面,研究文章众多,一方面是研究两个舆论场的性质和特征,探讨通过打通两个舆论场,构建社会舆论引导的新格局的问题。另一方面则是研究在新媒体条件下官方舆论场与新媒体舆论场之间的互动与博弈、冲突与融合的复杂情形,探讨如何寻求双方“最大公约数”,从而达到舆论平衡的问题。

国外关于舆论场的研究以理论探讨为主。国外舆论场的概念最初源于物理学中的磁场概念,由英国物理学家法拉第提出了“场”的概念,“场”概念的提出为人们提供了一种不通过直接接触而产生相互作用的模型。此后,场概念的运用范围逐渐超出了物理学范畴,并向其他学科渗透,从而催生了众多的场概念和理论,比如“心物场”、“大众传播场”、“电视场”、“新闻场”、“媒介场”等。社会学家迪尔凯姆率先引入和使用“场”概念。在迪尔凯姆的视野里,社会场是社会有机体及其子系统周围连续存在的特殊物质形态。而布迪厄的“场域”理论,认为场域是一个关系争夺网络,是力的较量场所和空间。场域不仅是现实的,而且是历史的;不仅是静止的,而且是动态的;其场域理论对研究中国的网络舆论新现象最具启发和指导意义^⑬。国外关于舆论场的主要理论有“沉默的螺旋”理论、“议程设置”理论等。其中议程设置是对复杂的媒介属性议程的设置进行研究,对当前舆论场研究具有较大借鉴价值和作用。

三、舆论场演化分析

改革开放以来,国内舆论场演化经历了由单一向多元、由分裂到融合的过程。至现阶段两者共识度逐渐加深,舆论生态渐趋于良好。其演化过程表现在:

1、主流媒体舆论主导时期

很长时间以来,我国舆论处于主流媒体“主导舆论”的时代,直至上世纪九十年代以来互联网诞生后这一格局才有所改变。

所谓主流媒体“主导舆论”,并非指主流媒体成为唯一舆论来源,而是指在我国特殊的政治及社会结构中,居于大众传播中心地位的是传统的报纸、广播、电视等专业传播机构。他们不仅掌握着社会公共话语权,掌握着社会最重要的传播渠道和庞大的受众群体,并凭借强大的影响力对公众施加影响,引导甚至改变公众对社会事务的看法,从而形成了主流媒体舆论占据社会舆论主导地位的时代。

主流媒体舆论主导时代,形成了我国特殊的统一舆论场格局。这对于报道国家政策、动员社会力量、传播社会正气、推动社会经济发展发挥着积极作用。然而,传统主流媒体自上而下的传播方式缺少反馈与互动,往往导致受众只能被动地接收信息,言论得不到正常表达,普通群众被屏蔽在主流媒体舆论场之外。

进一步看,当代中国的传统媒体内嵌于特定的政治体制框架中,在这一框架内,媒体报道什么、不报道什么,都受到相关部门的引导,媒体的舆论表达受到外部约束结构的限制,媒体的舆论呈现高度政治化,社会舆论也严重政治化^⑭。这实际上是建构了一套从政府到媒体、从媒体到受众的单向的相对封闭的话语控制系统^⑮。此外,主流媒体倾向于“报喜不报忧”,对报道内容做风险过滤,设置议程,重视正面典型报道,使得最终呈现在媒体上的舆论与真实舆论间存在落差,这就造成了主流媒体舆论话语脱离社会的问题。虽然在我国经过1980年代中期的新闻改革,以及1990年代的传媒市场化改革、推进了舆论表达的多种渠道,但社会舆论在主流媒体与市场化媒体上呈现出的更多是边缘突破的特征,主流媒体主导舆论的基本格局仍然没

有改变。

2、自媒体舆论萌芽时期

上世纪90年代以来,随着网络的普及和新媒体的兴起,尤其是以博客、贴吧为代表的自媒体的出现,让普通网民拥有了表达个人意见和观点的平台,解构了传统媒体对话语权的垄断局面。自媒体舆论空间在国内社会舆论中脱颖而出,形成一只不容忽视的独立话语力量。

2004年,以个人博客为代表的自媒体在我国进入迅猛发展时期,博客具有“零技术、零成本、零编辑、零形式”的特性,进入门槛低使其成为实现个人话语权的平台,每个网民都可以建立自己的网络空间,基本不受限制地发表言论,公众在网络空间的自由表达,形成了一个自媒体舆论场。

2006年以来,一种新型的社会化媒体——微博在国内风起云涌,微博作为开放的信息平台,进一步降低了公众的进入门槛,成为网络舆论的发源地和聚集地,推动了社会表达热情的空前高涨。多类型、多元化的传播主体使得传统媒体自上而下的话语体系被弱化,传播资源的泛社会化和传播权力的全民化,使传播力量由国家转移到社会,解构了国家对传播权力的垄断^[16]。自媒体的兴起,使社会大众能够针对任一社会问题或社会现象随时随地发表意见,诸多意见在网络空间聚集和传播,就形成了强大的网络舆情场。

自媒体的兴起,提升了普通老百姓的话语权和表达权,但由于自媒体平台是以兴趣为出发点的个人行为,大多以自己感兴趣的内容为主,具有自发性。另一方面,随着转型期社会利益格局的调整、社会矛盾的增加,自媒体平台成为社会不满和愤懑的发泄场和热点舆论的爆发地,不断激起巨大的舆论反响,对整个社会舆论产生极大冲击和影响,但由于自媒体舆论以个体表达为主,总体上呈现出“一盘散沙”的状态。

3、自媒体舆论对主流媒体舆论形成冲击时期

尽管早期的网络舆论声势小,不足以影响主流媒体舆论。但随着微博、微信、社交网络等各种自媒体的影响力扩大,新媒体中的观点和立场越来越冲击到社会主流媒体。换言之,以2004年来博客传播的盛行、2006年来微博等社会化媒体的兴起和繁荣为起点,社会化媒体舆论及其议论横生、众声喧哗、民意涌动的现象及表现,对整个社会舆论结构和环境的“颠覆”、“重构”带来了巨大影响。

处于转型期的中国,社会矛盾日益尖锐,贫富差距、医疗教育、环境污染等问题凸显,加上公众对主流媒体一贯的正面报道产生不信任感,政府部门公信力下降,导致主流媒体舆论受到公众普遍质疑。在此背景下,与新媒体呈现的草根言论,以网络舆论领袖的意见,形成了与官方舆论场之间的一次次正面博弈。从而出现我国特有的主流媒体舆论与自媒体舆论分庭抗礼的舆论景观。如针对主流媒体对某一社会现象的报道,网络草根和边缘群体总是表现出不满和不服从,发表带有仇官仇富的色彩网络言论;而对一些网络热点事件,传统媒体有时集体失声,不见报道。主流媒体舆论与自媒体舆论呈现出截然相反的态度,造成话语失衡怪象。

在这场新的舆论博弈中,中国网民作为具有舆论能量的“新意见阶层”,正在形成一个有现实影响力的虚拟“压力集团”,最终产生倒逼效应^⑯。在涉及公共利益和弱势群体的事件中,意见领袖和网络草根的话语指向一致,容易联合起来,对政府部门带来舆论压力。而传统主流媒体在这场舆论博弈中虽然占据了强大的传播渠道,但却无法更好地引导和应对民间舆论的涌现,表现出一些失语和缺位。因此,加大主流媒体舆论对自媒体舆论的引导成为一个重要的研究主题。

4、主流媒体舆论与自媒体舆论和谐共生时期

近三年来,随着国家加大对新媒体的治理和社会大众媒介素养的提升,我国社会整体舆论逐渐进入一个和谐共生的时代,两个舆论场开始趋于交集。据人民网舆情监测室报告,近三年来,在政府和社会各界的共同努力下,两个舆论场的交集和共识度有显著增强。研究显示“体制内媒体、意见领袖和网民这三大舆论场域,已走出2009年共识度的最低值,2011年达到最高值。三大舆论场域对政府在热点事件中的表现,认同度也从2009年开始整体逐渐上升,2013年略有下降,但2014年达到最大值”^⑰。

【下转 P4】